

中国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本土化开发

张洪铭

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, 广东 广州 510006

摘要: 公共服务动机 (PSM) 的经典测量工具源于西方, 其跨文化适配性是学界关注的焦点。本研究以中国大学生群体为对象, 采用“质性探索 + 量化校验”的混合方法开发本土化量表。首先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扎根理论建构初始维度 (592 个参考点, 20 个节点); 其次经探索性 (EFA) 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(CFA), 确立了含“公共事务关注”“奉献精神”“完善与发展”3 个维度 14 个题项的最终量表。本文基于此开发过程, 剖析了“维度预设”与“数据驱动”的内在张力, 验证了多重数据筛查机制的控制效用, 并探讨了本土结构与西方经典框架的对话路径, 旨在为跨文化量表开发提供方法学镜鉴。

关键词: 公共服务动机; 量表开发; 跨文化研究; 混合方法; 方法学反思

DOI: 10.64649/yh.shfzykjc.issn3078-8994.202607040

0 引言

公共服务动机 (PSM) 的概念与经典量表 (Perry, 1996) 源于西方情境。随着跨文化研究的推进, 学界发现简单的“翻译—回译”在跨群体应用时面临解释力衰减的风险。近年来, 中国学界推进了 PSM 量表的本土化 (包元杰和李超平, 2016; 杨开峰和杨慧珊, 2021), 但多聚焦于在职公职人员。

大学生作为准公共部门的人力储备, 其价值观与社会阅历与在职人员存在结构性差异。若直接套用既有量表, 易面临“维度结构不契合”与“语言情境难理解”的方法学风险。基于此, 本研究通过扎根理论与量化校验相结合的混合方法, 开发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的本土化量表, 并对跨文化量表开发中的路径选择、维度预设与模型校验等环节展开方法学反思。

1 理论背景与量表开发路径选择

回顾中国情境下 PSM 量表的本土化探索, 可归纳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学路径。

一是“翻译—回译”路径。该路径沿用西方跨文化量表 (如 Kim 等, 2013) 的框架, 通过标准翻译程序与统计检验完成修订。其优势在于研究成本低且便于跨国比较; 局限在于本土化深度不足, 无法容纳中国情境下特有的动机维度。该路径隐含了“中西方群体心理结构同构”的假设, 这在大学生群体中较难成立。

二是“维度扩展”路径。在原量表维度基础上叠加本土新维度。例如, 杨开峰和杨慧珊 (2021) 在 Perry 的 4 维度上增加了“社会认可与名声”和“道德坚持”。该路径保留了对话通道并增强了本土解释力, 但新维度的添加多

基于理论推演, 缺乏自下而上的数据驱动支撑。

三是“扎根理论本土化”路径。悬置既有理论框架, 以目标群体的质性访谈资料为起点, 自下而上归纳维度与节点, 再通过量化数据进行校验 (刘华兴和王铮, 2022)。考虑到大学生群体在认知结构与生活情境上的独特性, 本研究选择此路径。尽管该路径面临“扎根开放性”与“概念可对话性”之间的方法学张力, 但其能最大程度还原大学生 PSM 的真实面貌。

2 质性探索: 大学生 PSM 维度的扎根建构

2.1 访谈设计与资料收集

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, 提纲围绕“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、来源与外显行为”展开, 并预留开放追问空间。考虑到受访者分布及外部情境约束, 采用“视频 + 电话”双通道收集资料。为控制自动转录在方言词汇、语气词上的偏差, 研究团队对 AI 转录文本进行了逐句人工核验。这一“机器转录 + 人工核验”的混合策略, 有效平衡了编码效率与信度。

2.2 三级编码与结构初探

编码过程遵循“开放—关联—核心”的三级逻辑。开放编码阶段尽量悬置理论预设, 从访谈文本中提炼本土表述; 关联编码与核心编码阶段则以 Perry (1996) 框架为“参考性对话框架”, 为本土维度的归类提供参照。最终凝练出 6 个评价维度、20 个节点 (合计 592 个参考点, 详见表 1)。该过程不仅保留了与西方经典理论对应的 4 个维度 (公共政策吸引、公共利益承诺、同情心、自我牺牲), 还提炼出具有中国大学生特色的 2 个新维度 (集体主义倾向、自我完善与发展)。

表 1 中国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的编码表（核心式—关联式—开放式）

核心式编码	关联式编码	开放式编码
中国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（592）	公共政策吸引（73）	主动了解国家大事和社会公共事件（18）；主动关注学校政策、活动与学生权益（32）；主动对政策、措施改进或提出建议（23）
	公共利益承诺（124）	对工作富有责任心与使命感（54）；能为公共事业主动作为（46）；认为公共服务对他人有价值（24）
	同情心（91）	关注弱势群体的困难（26）；具有很强的助人意识（34）；具有共情能力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（31）
	自我牺牲（81）	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帮助他人（36）；不计回报地服务他人（14）；为公共利益敢于冒险，甘愿吃苦（31）
	集体主义倾向（128）	相比于个人利益，优先考虑集体利益（33）；具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（22）；乐意为集体和国家做贡献（52）；愿意效仿平民英雄的行为（18）
	自我完善与发展（98）	拓展人际关系（23）；提升个人综合素质（41）；重视公共服务的成就感和荣誉感（19）；认为公共服务是自我价值的实现（15）

3 量化校验：量表信效度检验与结构固化

3.1 样本采集与筛查机制

正式调研采用“分层+便利”抽样，回收问卷 558 份，有效样本 526 份。针对中国情境下自报式量表易出现的“社会赞许性偏差”，本研究嵌入了三项协同筛查机制：反向题项（识别全选同意）、常识性题项（注意力陷阱）与答题时长控制。

3.2 探索性因子分析（EFA）

将有效样本随机分半。初始 20 题项量表的 KMO 值为 0.921（ $p < 0.001$ ）。EFA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 3 个公因子（而非质性预设的 6 维度）。经题项净化（删除载荷 < 0.5 或交叉载荷 > 0.4 的 S5、F6、F7），保留 17 题。3 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70.43%。总量表 Cronbach's α 系数为 0.928，“公共事务关注”“奉献精神”“完善与发展”3 个维度的 α 系数均高于 0.84，内部一致性良好。

3.3 验证性因子分析（CFA）

利用另一半样本进行 CFA。经修正，确立 3 维度 14 题项模型。拟合指标表现优良： $\chi^2/df=1.817$ ，RMR=0.042，RMSEA=0.056，GFI=0.933，CFI=0.963。结果表明，该结构在中国大学生样本中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。

4 综合讨论与方法学反思

4.1 维度预设与数据驱动的双轨互校

质性预设了 6 维度，量化仅提取出 3 因子。面对这一矛盾，本研究重审内涵发现：6 维度属“主题分类”（如关心的政策或集体），3

因子属深层“心理结构”，二者抽象层次不同。研究据此将 6 维度的节点整合为 3 维度。这一“质性回看—结构对话”的双轨互校机制，有效避免了“理论先行偏差”与“数据暴力”两种极端，为混合研究的数据整合提供了新思路。

4.2 筛查机制在中国情境的必要性

PSM 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兼具“高社会期望”与“低熟悉度”。本研究证实，反向题、常识题与时长控制的协同使用，能实质性回应社会赞许性偏差与随意作答问题。这套筛查程序应作为中国情境下量表开发的标准化动作。

4.3 本土结构与 Perry 框架的理论对话

最终确立的 3 维度实现了与 Perry 和 Wise（1990）“规范—情感—理性”动机框架的跨文化对话：“公共事务关注”对应规范动机；“奉献精神”对应情感动机；“完善与发展”对应理性动机，承认了公共服务中的合理“自利”成分。这为原量表中较难操作化的理性维度提供了中国时代特征的表达，立足本土语料实现了核心概念的重构。

5 结论与展望

本研究开发了具备良好信效度的中国大学生 PSM 量表（3 维度、14 题项，见表 2）。研究表明，跨文化量表开发应基于“理论—群体—情境”谨慎选择本土化路径；在质性与量化交汇处坚持“双轨互校”；嵌入适应本土作答习惯的筛查机制；并在凸显本土颗粒度的同时保持国际对话能力。本研究局限在于前期样本多集中于华南地区，未来可通过“跨群体—跨时点”的纵向数据进一步验证其测量等值性。

表2 中国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量表（3 维度 14 题项）

维度（动机类型）	题项
公共事务关注（规范动机）	我会主动关注学校政策、活动与学生权益，而不是习惯被告知或遇到问题时才临时求教他人。 (2) 我平时会主动了解国家大事和社会公共事件。 (3) 我会主动对政策、措施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，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采纳。 (4) 我会主动地与他人分享和讨论我对某一政策或制度的看法。
奉献精神（情感动机）	我会主动关注身边的弱势群体或有困难的人，并伸出援手。 我愿意牺牲个人利益，优先考虑集体。 我认为自己对工作具有责任心与使命感。 我愿意效仿平民英雄的行为，并加入他们的行列。 (5) 我认为自己能够为公共利益勇于冒险、甘于吃苦。
完善与发展（理性动机）	我认为自己能够为公共事业主动作为。 我非常重视参与公共服务带来的成就感与荣誉感。 我认为公共服务对社会、对他人是有价值的，同时也能够实现自我价值。 我希望通过从事公共服务来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。 (5) 我认为参与公共服务能帮助我拓展人际关系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包元杰,李超平.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:理论结构与量表修订[J].中国人力资源开发,2016(07):83-91.

[2] 李悦池,姚小玲.高校女教师职业倦怠的归因分析——基于 NVivo10 的质性研究[J].高教探索,2017(12):114-118.

[3] 刘华兴,王铮.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测量[J].上海交通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22,30(01):107-122.

[4] 孙德超,周媛媛.从繁文缛节到有效规则:精准扶贫目标置换问题的治理路径[J].学术研究,2020(06):58-62.

[5] 谭新雨,吴维旭.新时代制度环境激励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微观逻辑[J].东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1,23(06):82-90.

[6] 文博,陶磊.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理论构建与绩效转换机制[J].心理科学进展,2022,30(02):239-254.

[7] 杨开峰,杨慧珊.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中国化[J].治理研究,2021,37(06):62-76+2.

[8] 赵琛徽,翟欣婷.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的提升路径研究——基于道德认同和志愿服务经历的作用[J].江西社会科学,2020,40(03):221-233.

[9] Brewer G A, Selden S C. Whistle Blowers in the Federal Civil Service: New Evidence of the Public Service Ethic[J].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,1998,8(3):413-439.

[10] Bozeman B, Su X H.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Concepts and Theory: A Critique[J].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,2015,75(5):700-710.

[11] Clerkin R M, Paynter S R, Taylor J K.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in Undergraduate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Decisions[J].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,2009,39(6):675-698.

[12] Coursey D H, Pandey K S.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Measurement Testing an Abridged Version of Perry’ s Proposed Scale[J].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,2007,39:547-568.

作者简介: 张洪铭(1983.07—),男,汉族,广东惠州人,博士,讲师,研究方向:思想政治教育、志愿服务政策。

项目信息: 2024 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“志愿服务视域下政策诱导与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——基于广东高校的实证研究”(2024GXSZ021,主持人:张洪铭)阶段性成果;2024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立项课题“志愿服务视域下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促进研究——基于广东高校的实证分析”(2024WT030,主持人:张洪铭)阶段性成果。